

Lawrence Stone

[英] 劳伦斯·斯通 著

贵族的危机

1558—1641年

s of the Aristocracy

于 民 王俊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Lawrence Stone
[英] 劳伦斯·斯通 著

贵族的危机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英)斯通(Stone, L.)著;于民,王俊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书名原文: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ISBN 978-7-208-09650-9

Ⅰ. ①贵… Ⅱ. ①斯… ②于… ③王… Ⅲ. ①贵族-研究-英国-1558～1641 Ⅳ. ①D75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0399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王小阳

贵族的危机

1558—1641年

[英]劳伦斯·斯通 著

于 民 王俊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3.25 插页 4 字数 230,000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650-9/K·1729

定价 45.00元

节缩本前言

这个节缩本的篇幅大约只有原版的一半。节缩本在对原版进行大幅度删减时，遵循了以下原则。其一，包括致谢、脚注、附录，以及对证据可靠性讨论在内的学术性注解都予以省略。其二，删除了大量例证和引证论据材料，仅保留了其中一些显然可用来相互佐证论点的部分。其三，有些部分因在某种意义上偏离或者绕开了论题而被全部删略。因此，很明显，这个版本实际上是原版的节缩本，建议凡意欲验证任何论据或数据之正确性者，最好查阅原版。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统计计算显然还饱受争议，使用者定须查阅著者关于它们缘何得出的解释，以及对这些统计计算构成的考据。但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删繁就简、去芜存精使冗长的原版变得简洁生动(无需太过费心劳神阅读)，而提升对更多读者的身心吸引力。

1965 年 10 月于普林斯顿

目录

第一章　引言/1

第一部分　危机的本质/15

第二章　社会中的贵族/17
一　社会的概念/17
二　社会结构/23
三　大贵族/30
第三章　荣耀的膨胀/38
一　乡绅和骑士/39
二　从男爵/45
三　大贵族/50
第四章　经济变革/63
一　收入估算/64
二　庄园计算/69
三　变革的事实/72
四　衰弱的原因/77
五　增长的原因/88
六　结论/93
第五章　权力/96
一　暴力的手段/96
二　暴力场景/108
三　秩序的成长/113
四　影响力的利用/125
五　结论/128

第二部分　收益与花费/135

第六章　地产管理/13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　租地政策/144
二　土地收入动向/155
第七章　工商业/161
一　地产开发/164
二　投资/174
第八章　职位和宫廷/184
一　伦敦和宫廷/185
二　直接封赏/192
三　间接封赏/200
四　职位负担/208
五　制度的影响/212
六　制度的后果/217
第九章　信贷/232
第十章　炫耀性支出/247

第三部分　观念和举止/267

第十一章　婚姻和家庭/269
第十二章　教育和文化/301
第十三章　宗教/330
第十四章　结论：信任危机/347
一　尊顺/347
二　结局/351
附录一　全部庄园持有量估计，1558—1641 年/353
附录二　酬赏，1558—1641 年/354

索引/356
译者说明/363

第一章

引　言

既有的观察研究表明，英国社会史图谱中巨大的研究空白随处可见，其中多半还贴着“饱富研究价值”的标签。本书之撰写正是为了填补英国社会史研究中最大和最为重要的空白。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当今人们的记忆中，数量不多的贵族数百年来虽一直被认为是以国家政治和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史的缔造者，却没有对他们进行过研究。贵族研究缺失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从近50年社会史研究的特点中找到解释。近50年来，社会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农民与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瓦解者，即所谓的进步乡绅和城市商人。欧洲大陆关于贵族的研究状况也并无明显不同，虽然对中世纪贵族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但对16和17世纪贵族的研究却相对欠缺。 1

本书的核心部分和绝大多数统计数据的时限，为1558年11月伊丽莎白女王即位至内战已不可避免时的1641年冬天。然而，在分析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时，在必要之处，时限上溯至16世纪早期，下延至17世纪中期，甚至是后期。这显然是合理的，因为这些缓慢变化因素除了对重大政治事件外，对其他一切都很难产生影响。

如稍作变通，从史学目的看，1558至1641年间的80多年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时间单位。它包括亨利八世革命之后的稳定期及随之而来的崩解期。期间历经了政治、社会、思想和宗教根本性变革的最关键阶段。这时，英国拥有爵位的人数，既没有少到由他们构成的统计

样本无足轻重，也没有多到一个史学家难以驾驭的地步。尽管382名
2 贵族是本书的主题，但信手拈来的资料，却用作了论证无爵位的宫廷精英或乡村大领主思想与行为的重要证据。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社会等级角度上界定，爵位不仅被当作一种荣耀，更多地被当作了一种标志。

贵族研究相对缺失的主要原因是，直到最近才有资料可为研究之用，而之前根本无研究的资料基础。这些未经分门别类、鲜为人知且难以获得的资料原广藏于民间私邸。然而，过去20年来档案学革命发生了。现今，许多私人藏品储存于地方档案局；余之大部分在国家档案登记处都有登记，幸亏这些睿智仁慈、慷慨大方的收藏者，凡获得适当资格的研究者即可查阅。因此，直到在二战后，对贵族的深入细致研究才成为可能，因为这时国家档案中的材料才能对家族档案予以补缺。

如本书这类力图探索描述一群早已离世的男男女女私生活琐事和思想的研究，如能进行，只有在16世纪中期之后。其一，约在此时，私人信函数量因地产阶层读写能力提高而大量增加，随之又涌现出大量自传性文集、家训和其他相关的个人文件。其二，这时期贵族家庭的财政和地产存世档案数量骤然增加。其三，国家机器在社会中的作用扩大，使得公共档案中的财政档案、诉讼诉证，及与政府的书信数量空前增加。如此，档案材料的数量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数量更多，且主要属于私人档案。

尽管许多背景思想来自法国史学流派，但本书的研究路径却与之不同，突出表现为不太重视逻辑体系。之所以如此，是希望能够避免过
3 分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决定性，并给予意识形态和愿望、偏见与习俗等以应有的重视。个人与群体行为中包含了更多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原动力，远比能够在统计表中列示的要多，而且更为有力。

然而，构建起本书骨架的恰恰是统计学。正如尼布利的约翰·史

密斯* 300年前所评论的那样，“平民往昔的成就和行为只偶尔地在浩淼的时间港湾里显现”。如果赋予这些稍纵即逝的显现以历史意义的话，就必须确保它们具有典型代表性，而揭示是否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则唯有统计学。政治史与之不同，要简单得多。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都只有一位首相，如此，外交方针或经济方针至多也不超过三个。社会群体却是由大量作为个体的人组成，每个个体都与群体标准存在偏差。从混乱的个体行为中推论出行为的一致性样式，以及分辨哪个是典型性样本和哪个样本发生了突变，统计度量是唯一的方法。仅根据少量早已引起关注或保存良好的例证，而不应用统计控制方法，会导致有关社会现象的结论几乎是不着边际和难以想象的。

这里还存在第二个危险，正因此社会史学家才不太注意把统计控制应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危险的因起，可能如有人最初推测的那样，是现存私人档案并不是完全随机抽样。现存私人档案是一个样本选择，选择的重点是那些在正飞黄腾达和已拥有难以散尽与挥霍一空的巨额浮财的家族。也正因此，现存私人档案偏爱崭露头角的新崛起者和富商巨贾，而漠视失败者和中等土地所有者。对档案保存完善的个体家族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但应避免试图对这些选择进行归纳概括，这不仅是因为选择范围过窄不能形成样本，还因为这种选择包含了与生俱来的偏见。统计带来的是除非佐以人性美酒才能吞咽的枯燥乏味的“食品”。因此，统计仅仅被用作一种工具，用于检验三代夸夸其谈、爱好争论且固执己见的男女贵族发生的繁杂紊乱的奇闻轶事和言论的意义。

本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近年来，17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因被阐 4
释为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误解。实际上，14—19世纪，英国社会结构变化些微，只不过是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

* 约翰·史密斯(1567—1643)，1589—1640年担任伯克利家族的管家，是弗吉尼亚殖民计划的倡导者和参与者，曾任弗吉尼亚公司的第一任司库，著有《伯克利家族传》。——译者注

结构中，不同社会阶层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E · H · 卡尔*教授近来提醒我们：根本不存在不受成长经历和背景影响的历史学家。我不能妄称对这一难以避免的人类心智局限有特别的免疫力。我所能做的，是示以个人的坦诚，这或许有助于反驳预设偏见的指责。起初，我认为16和17世纪贵族困难的根本在于财政。尽管我比任何时候都确信，贵族在16世纪末期经历了一个严重财政危机，但对于财政危机是导致贵族困难的唯一原因，甚或是必须的首要原因的观点，我不再支持。越来越明显的是，一个阶层内部经济变革(导致贵族困难的观点)无论如何都会引起解释和度量上的严重问题。现在，我相信，单一因素不能解释17世纪中期的剧变，它是多种推力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些推力，历史学家们迄今尚未涉及，而甘愿把它们留给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历史因果关系从经济学解释到社会学解释的转变，决不是个人创举，它是1930年以来对史学态度普遍重新审视的一部分。

我最初的第二个成见是：贵族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多余寄生群体。尽管我依然不欣赏这样的景象：一小撮贵族家族在一个贫困的社会里独占一大部分可用经济资源，而且向顺从怕事、食不果腹和文化程度很低，但却是他们衣食父母的民众炫耀他们自以为是的奢华与安逸舒适。但道德义愤却无助于对过去的清晰思考和同情的理解。这是现今已知世界绝大多数前工业社会的等级模式，假定它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是毫无根据的。在任何情况下，这一时期的英国贵族与其他时候和其他地方精英的区别，是他们相对温和的财富和权力欲，以及其中一些贵族表现出来的相对社会责任感。

5 把过去300年来英国事务的平稳演化看作一种异乎寻常的上天恩赐，或许只不过是岛国居民自鸣得意的证据。但是，难免会得出这样

---

* 即爱德华 · 霍列特 · 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 1892—1982),英国左翼历史学家。——译者注

的结论：平稳的原因应主要从特权者不愿意进行最后决战中寻找，而不是从改革者把他们推到了生死边缘中探得。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在权势集团推动下，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具有超强的适应性，是英国历史明显不同于它的大陆邻国历史的首要特征。虽然，软弱严重降低了英国大贵族对1640—1642年事件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他们早已接受过最好的教育，极富政治意识，不再过多受社会地位困扰，不再对王权死心塌地，并且可能除了瑞典之外，愿意尽可能地接受任何欧洲贵族的新才智和新思想。

本书试图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描述精英分子所处的整体环境，即物质和经济环境、思想意识和文化环境、教育和道德环境；其二，论证、阐释和图绘精英分子事务危机的过程，这些过程对英国政治制度演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需要同时进行静态描述和动态分析；社会史、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也被刻意用来充当了政治史的序言和阐释。然而，对后者的如此关注，并不意味着上院在国家事务中扮演的作用被有意地置于研究范围之外。

因为成功的政治家和非常富有的乡绅通常会被授予一个爵位，所以，贵族形成一种精英，同时，社会精英的主要组成部分，则形成了财富精英和权力精英。因此，精英引领的生活方式对于正确理解过去尤为重要。每个社会都有一种精英，或更确切地说有上述三种精英，一个社会与另一社会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可从三种精英间的不同特征中寻得：精英内部重叠性多群组间的关系、精英内部的团结或分裂程度、增补体制、升列精英的难或易、精英生活的宗教和道德框架。

本书的第二个目标是在合理的承受力内尽可能详尽地描述精英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最终形态直到20世纪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贵族生活舒适安逸，以乡村庄园为基础，主要以农业收益为财源，并由众多仆从侍奉。贵族的这些生活准则，与17世纪中期的那些起而挑战它并最终推翻了它的那些生活准则，有着本质不同。资本主义或新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徒的伦理，是自我修养、自立节约、勤奋工作、洁德自律、竞争、机会均等、贫困和道德懦弱相伴而生。贵族伦理是志愿服务于国家、慷慨好客、明确的等级差别、社会稳定、对情欲罪孽忍让冷漠、对意外遗产的不平等机会、狂妄傲慢的自信、对经济上的附庸及下属的家长式的和以恩人自居的姿态、认为虐待下层等级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在这个混乱动荡的时代，即使包括克伦威尔*在内的许多人都兼有这两种伦理思想，也丝毫不能减少它们之间既存的根本矛盾。

本书主要专注于一系列变革的分析，这些变革有助于对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问题的阐释。在17世纪前半期，英国发生了某些非常古怪的事情。下院作为远比上院重要的政治集会崭露头角，贵族也不能影响议会选举，而在伊丽莎白时期这种影响还行之有效，并在汉诺威王朝时期贵族还再度有效地影响过议会选举。此外，1642年，在一小撮持不同政见贵族的支持下，一个由乡绅和市民组成的团体，极端厚颜无耻地向国王、主教、绝大多数贵族及其支持者们提出了挑战，甚至打败了他们。几年后，上院被完全废除，这是一个政治外科手术，是20世纪的激进分子不想或者无法完成的事情。因此，17世纪中期历经了王权、贵族和安立甘教会的没落。有关社会、经济、性和政治平等的激进思想也昙花一现。无可否认，所有这一切都没持续太久，到17世纪末，
7 和安立甘教士及国王一样，贵族重新获得了控制权。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时权力集团间的重新搭配却如同一匹马的设计不配套的马嚼和马勒、马镫和马鞭。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呢？长期以来，惯常于把这些事件解释为因特别事件、个性和政策引发的危机，如：詹姆斯的不称职，白金汉**的

---

* 即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宗教领袖，英国内战中独立派的首领。1649年，在城市平民和自耕农压力下，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宣布成立共和国，1659年，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自任“护国主”。——译者注

** 即第1代白金汉公爵(英国历史上第二次封授的白金汉公爵爵位)乔治·维利尔斯(1592—1628)，詹姆斯一世及查理一世的宫廷宠臣，1623年获白金汉公爵封号，1628年被约翰·费尔顿刺死。由于他的得势与统治对英国的政治生活影响巨大，因此，有人甚至把英国内战的原因归咎于他。——译者注

贪污腐败，斯特拉福德*、劳德**和查理的固执己见，清教的崛起；宪政意识的成长，由下院改进的程序技巧的发展。所有在既定研究范围内的解释都令人满意，而且实际上，所有这些合起来还能为1642年内战爆发时人们划分阵线的争论提供最好的指南。但是，它们却没有对当权者整体尊重的日衰做出解释，而这正导致了他们饱受挑战。

有一种解释是：金融权益受衰败封建贵族顽固束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阶层经济资源的增长，及因之而来的政治影响的增长。这一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风靡一时的假说，近来受到了一些强烈抨击。所谓的1540—1640年工业革命已失去了其影响，就货币投资或人员雇佣而言，现在看来只是一个相对较小规模的发展。现已明确，绝大多数市镇，尤其是伦敦寡头政治领导者，是国王恩赐制的忠实成员，是经济事务和市镇政府专营权的受益者；现也已得知，在任何情况下，下院成员中市民人数决不会超过10%，且他们的活动根本没有任何卓著之处。

本书中对贵族形象的描述仍是对其既定形象的进一步质疑。1641年时的贵族决不再有显著的封建性：如果他们为国家而战，会因服兵役而获得报酬；他们在上院中的席位与封建土地保有制没有关系；贵族与其附庸乡绅通过个人而非封建的纽带建立起契约关系；贵族及其佃户间封建的一面，局限于诸如监护权罚金之类间歇性加强的陈旧税收上；在时代和贵族公平对待佃户的父权制观念允许的范围内，贵族对地产实行了尽可能先进的管理；贵族对新兴工商业的冒险投机热情远远高于商人；对贵族权威的挑战不是来自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是来自唯一的社会和经济阶层等级急剧降低了的顽固土地所有者，以及缙绅***和大乡

* 即托马斯·温特沃斯(1593—1641)，曾是议会中反对专制政体的反对派领袖之一，后退出反对派，于1628年转而为国王服务，1640年获伯爵爵位，在政府中身居要职，成为查理一世的宠臣。1641年，以叛国罪被处死。——译者注

** 威廉·劳德(1573—1645)，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查理一世宗教事务的首席顾问，提倡一种类似于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和仪式。1641年被议会以叛国罪名弹劾。1645年被处死。——译者注

*** 缙绅是一个身份地位含混不清的概念，总的看来，其身份地位低于骑士，高于约曼。有学者认为，缙绅属于广义的乡绅阶层范围，英国的缙绅与中国的缙绅有很大区别。——译者注

绅。至于真正的新人，即富有商人，他们过于执著在海外随波逐流的争夺，根本不想摧毁贵族权威。

一个更为方兴未艾的设想是“乡绅的崛起”。在经济范畴上，此设想主要被认为是：一个富裕新阶层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以商业化路线运作其不断扩大的地产。乡绅阶层虽然充斥着下院议席，但他们对与其经济资源相称的政治权力要求，却自始至终受到国王阻碍。这幅动人的设想图谱因为不但有大量乡绅崛起而且同样有大量乡绅衰弱这一发现而令人迷乱不解，因此，所有的崛起和衰弱一度似乎全然可疑。相互冲突的证据毫无疑问地证明的一点是：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中间土地所有者集团经济上流动的时期，相当数量的家族历经了兴衰沉浮。毋庸再有任何怀疑，与1540年相比，1640年时，有更多的土地，并因之有更大比例的国民财富，掌握在非贵族的私人手中。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经济上流动是否提高了数量有限的郡中世家的财富，或者是否增加了较小乡绅的数量，或者二者是否都有增加。较小乡绅数量的增加毫无疑问已经证实，但郡中世家财富的增加还仍只是一种可能，虽然证据已似乎表明了这种可能性。然而，没有被证实的是：严格意义上的重要乡绅的财富和拥有的地区性资源增长，可足以明确作为他们夺取政治主动权的理由。

一种标新立异的假说是：内战中的议会派主要由次要的、落后的、衰败的乡绅组成，这些乡绅对国王和教会的忠诚已经因其经济困境而削弱。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证据都与这一具有独创性的理论相矛盾。北部和西部贫穷的边地人不仅不是议会党人，而且是保王党的中坚核心，尽管除了重税和傲慢的蔑视之外一无所得，他们还是为宫廷和国王一直
9 战斗到底。另一方面，1642年议会派领导者和积极支持者的名录，宛如最为重要郡中世家的名单：巴林顿、巴纳迪斯顿、贝恩顿、寇松、戴克斯、德赖登、厄尔、黑尔斯、汉普登、亨格福德、奈特利、翁斯洛、佩勒姆和沃洛普。没有贫穷或衰败的乡绅因为财政困境而被迫起而反叛。这是完全正确的：随着战争的拖延，来自于低下等乡绅的更多激

进因素开始惹人注意，起先在地方政府层面，后来扩展到了国家政府层面。但这是战争压力的结果，既不能解释以政府信任普遍崩溃为表现形式的最初危机，也不能解释战争本身的爆发。

1640—1642年社会政治崩溃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对王权尊敬和忠顺的衰弱。造成衰弱的部分原因分别在于国王个人的不称职，财政困境的增长，宫廷体制的结构性缺陷，宫廷和国民在道德标准、愿望及生活方式上差距的扩大。衰弱始自伊丽莎白女王后期，詹姆斯一世时衰弱的推动力渐增，白金汉时期已成雪崩之势，查理一世在位期间的1629年之后，衰弱已经难以抑制。第二个原因是国教教会内部几乎包罗一切，但却失败地把天主教排除在外。伊丽莎白、惠特吉夫特*和劳德曾设法在国教教会和天主教之间疏离安立甘教会这个信念影响力不断增长的团体。1630年代，劳德最后实施的一着，即他在1640年导致整个国家栋折榱坏的政策中，与宗教仪式和教会组织有关的政策，至少与有关社会和经济事务政策同样多。

如果没有第三个原因，即贵族这个世袭精英的事务危机，单单上述两个原因，还不能引起1640年代持久的剧变。在一段时期内，贵族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社会和政治的主动权从而落入地主阶层手中。贵族向日益强大的国家交出了其人身强制权力；贵族永久性地让渡了大量土地资本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诚然这个时期并不太长，贵族购买力绝对下降了；随之而来的贵族提高租金和进入金**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旧的个人效忠纽带；贵族被迫与自信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乡绅分享越来越多的行政和政治的最高职权；同时，分别部分地因为与腐化淫乱及最终与专制宫廷联系在一起的罪行、许多成员都属于可怕和可憎的宗教少数派、清教徒良知的作用，贵族的影响和声望大多暂时性地丧失了。乡绅崛起是因为贵族的暂时衰弱，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当然不

10

---

* 即约翰·惠特吉夫特(1530—1604)，早期反清教徒的首脑人物，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译者注

** 进入金实际上是一种更新契约的特别租费。——译者注

完全——是一种错觉。

本书首要关注的是这些英国生活中的第三个剧变，尽管也附带性地对其他两个剧变加以阐释说明。早期都铎王朝曾努力且不无成功地削弱了被认作是对准专制王权一种威胁的贵族力量。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一般认为，社会平衡就是正义，贵族担负的重要作用，借用福尔克·格雷维尔*的名言说，是“王权和民众间伟大的半中平台”。17世纪初期，一切都走得太远了，且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在开始试图扶大厦将倾上太过着急。同世纪中叶的共和主义者亨利·内维尔写道：“尽管他们的靠山和权力都失去了，但我们却不能没有他们”。贵族事务的多方面危机本身并没有导致内战，但却为使内战成为可能创造了条件。正如那时詹姆斯·哈林顿**所言：“王权剥去尊荣的外装后，在天下即无以为庇，只能托护于军队。因此，是政府的解体导致了战争，而不是战争导致了政府的解体。”

把这个危机与250年后的危机加以比较非常有益，其时，土地贵族最终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政治和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整个19世纪，一系列力量削弱了贵族地位。政党组织和公众集会的发展，降低了个人关系作为政治影响关键的重要性；美德取代任人唯亲和金钱作为晋身文官的标准，中止了许多获利和谋取职位的途径；作为一种地方议会的季审
11 法庭的废除，摧毁了另一个强大的贵族权威工具。最后，恰在一个巨额新财富产生于商业和工业的时代，农业萧条、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合起来侵蚀了大贵族的财政基础。然而，直到世纪之交贵族才最终屈服。由基督教福音派而强化的贵族的强烈公共责任意识，使得他们继续在军队和印度服役。有些贵族，如塞西尔父子，继续在国家政治中独领风骚。实际上，贵族权力基础在乡村遭到普遍侵蚀后的许多年

---

* 福尔克·格雷维尔(1554—1628)，伊丽莎白一世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诗人，剧作家和政治家，曾任海军司库、财政大臣等职。——译者注

** 詹姆斯·哈林顿(1611—1677)，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代表作《大洋国》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思想备受关注。——译者注

里，他们的高层权力仍能苟延残喘。直到1895年，持续了三代的贵族都在内阁中占多数，而且还在1945年的“看守内阁”中占了三分之一。

但由于上述力量的共同作用和民心的丧失，贵族最终走向毁灭。在一流公学和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接受过教育，与地产和血统优秀一样，被认为是身份地位的评价依据。上层中产阶级“没有土地，但他们却认为，在上帝眼中，他们都是土地所有者；他们通过研究专业和进入军界，而不是经由贸易保持了贵族式的风貌”。面对这一挑战，贵族放弃了他们的责任。他们不再庇护佃户和为帝国服役，而是沉湎于狩猎和狂欢女郎。国王鄙弃他们，转而支持来自城市的富有新贵；他们失去了公众和自我尊重，并且，故意与民选政府作对而自惹祸端。其结果是1911年议会法案的出台，该法案象征着贵族在英国行政、政治和社会中卓越作用的结束。

上之描述对16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来说早已耳熟能详。尽管有人认为，它们的影响一个如昙花一现，另一个则是永久性的，但这两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两个时期同样都经历了：新的且俗不可耐的财富对贵族阶层的渗透；贵族选民影响的衰弱；爵位声誉的衰微；在一个贪图享乐的国王领导之下贵族道德品行的坠落。两个时期都以上院权力遭到抨击和谘议会或内阁的社会构成发生变化而结束。

诸如“危机”和“革命”之类的词语不能轻易地翩然而至于历史学家的笔端。历史在缓慢的颠簸行进中很少能与过去割断联系。无论求变的压力作用如何施加影响，历史的惯性力都会使得人类事务有令人惊奇的连续性。然而，这一时期贵族所面临的上述境况被描述为危机，可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贵族为了适应快速变动的环境，几乎在思想和行为的所有领域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再调整。

虽然变革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并且任何变动都有其先行条件和后续发展这点已经得到认可，但中世纪和现代英国真正的分界线应当定在1560—1640年，更精确地应定在1580—1620年。这期间：国家全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